



简报说明：

关于性工作的错误信息

几个世纪以来，关于性工作的错误信息一直盛行，这些错误信息是由长期刻板印象、迷思和道德判断所推动的，持续塑造着政策和公众舆论。无论是散布虚假信息是蓄意欺骗，还是无意的分享，传播性工作相关的不准确和误导性信息，都会产生严重后果。本简报概述了围绕性工作的一些最常见的错误信息，提供了最近的例子，以表明它们在政策、研究和人权保护领域的影响。

混淆性工作与人口贩运和剥削

纵观历史，人口贩运的法律和论述侧重于“卖淫”，作为控制妇女流动、移徙和性行为的手段。今天，混淆人口贩运和性工作仍然是围绕性工作的最普遍的错误信息之一，其基础是原教旨女权主义和废娼主义意识形态，即将所有性工作等同于暴力和剥削。这种意识形态又为一系列有害的政策和实践提供信息，包括“终止需求”和“搜查拯救”模式，以及强制性的“康复”和“退出”服务。

虽然“终止需求”方法声称通过减少性工作和贩运来促进两性平等，但大量证据表明，将客户定为刑事犯罪加剧了性工作者对暴力、剥削和虐待的脆弱性，同时妨碍了识别人口贩运的真正受害者。¹此外，没有实质性证据表明，“终止需求”途径降低了性工作²或人口贩运³的发生率。

混淆性工作和人口贩运也强化了对以“剥削卖淫”为核心的国际法律框架的误解。而“剥削卖淫”这一概念经常被援引，但定义不明。例如，“终止需求”方法的支持者普遍声称，《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CEDAW)和《巴勒莫议定书》都要求各国禁止所有“卖淫”，因这是人口贩运和剥削的一种形式。然而，在起草《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期间记录的讨论表明，《公约》第6条要求各国“制止剥削卖淫者”⁴，是有意与制止所有卖淫的责任进行区分。⁵《巴勒莫议定书》所附的解释说明同样规定，《议定书》只涉及人口贩运背景下的“剥削卖淫”，而且没有界定何为“剥削他人卖淫”。⁶

尽管如此，原教旨女权主义者和废奴主义者仍利用“剥削卖淫”的模棱两可，促进“终止需求”。2020年11月，CEDAW委员会发表了《关于在全球移徙背景下贩运妇女和女童的一般性建

¹ NSWP, 2018, [“终止需求”立法对女性性工作者的影响。](#)

² Jay Levy 和 Pia Jakobsson, [“瑞典废娼主义叙述和法律：对瑞典性工作趋势和性工作者生活的影响”](#), *犯罪学与犯罪学司法* 14 (5) (2014) : 593-607.

³ Susanne Dodillet 和 Petra Östergren, 2011, [“瑞典买性法：声称的成功和效果记录。”](#)

⁴ 联合国大会, 1979年,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A/RES/34/180.”](#)

⁵ Janie Chuang,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评论中的“第6条”](#), 弗里曼等编 (牛津: 牛津大学出版社, 2011年), 176.

⁶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2006年,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及其议定书的阐明的谈判准备工作材料”](#), 347.

议》。⁷尽管性工作者主导组织一再呼吁《一般性建议》明确区分性工作、人口贩运和剥削，但 CEDAW 委员会最终无视这些建议，而去推动一个基于“终止需求”意识形态的有缺陷的政策议程。

有缺陷的证据

混淆性工作与剥削和贩运，也导致将关于人口贩运、强迫劳动和“现代奴役”的数据滥用在于性工作的政策和立场的决策过程。反人口贩运数据固有的问题又加剧了这种做法。

获得关于人口贩运和强迫劳动的可靠数据的困难，早已得到研究人员和学者⁸以及国际劳工组织（ILO）⁹和美国国务院¹⁰的承认。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也指出，由于这种剥削形式比其他更明显又更经常被报告，因此，统计偏差有可能扭曲对“性剥削”的衡量。¹¹在打击人口的贩运干预（如“搜查拯救”行动）中，经常针对性工作者并对其身份的错误定性，加上其他形式的劳动剥削较少被报告，进一步损害了这些数据，助长了有缺陷的“证据”的阴险、自我延续的循环。

数据也可能被歪曲，以不诚实的方式获得更高的百分比，以支持虚构的主张。在 2020 年 2 月的一个再竞选视频中，CEDAW 领导制定《关于在全球移徙背景下贩运妇女和女童的一般性建议》工作组主席表示，“90%的女性人口贩运受害者被以性剥削为目的贩运”。¹²虽然这一信息的来源没有披露，但该统计数据可能是对 UNODC 在 2018 年《全球人口贩运问题报告》（TIP）中数据的加工。该报告指出，83%的人口贩运妇女受害者被以性剥削为目的的贩运。¹³除了这种数字差异之外，由于 UNODC 的统计数据是基于大约全球四分之一国家的有限数据，因此不能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这一调查结果。

来自 UNODC 的 2018 年 TIP 报告的再加工数据也被用于起草 CEDAW 《关于在全球移徙背景下贩运妇女和女童的一般性建议》¹⁴，以及 2020 年 7 月出版的联合国妇女署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应对新出现的人口贩运趋势和 COVID-19 大流行的后果》。¹⁵在这些文件中，有选择地重新计算了 2018 年 TIP 报告中的 4 个数字，以取得更高的关于为性剥削目的的人口贩运的数字。这种形式的数据“黑客”不仅进一步掩盖了证据，而且这种缺乏透明度的做法令人关注当事人的动机和操守。

数据与数字化干预

⁷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2020，“[关于在全球移徙背景下贩运妇女和女童的第 38（2020）号一般性建议（CEDAW/C/GC/38）](#)。”

⁸ Elzbieta Gozdiak 和 Micah N. Bump，“[人口贩运数据与研究：基于研究的文献书目](#)。”（华盛顿特区：乔治敦大学，2008）。

⁹ 国际劳工组织，2012，“[ILO 强迫劳动全球估测：结果和方法](#)。”

¹⁰ 美国国务院，2016，“[人口贩运报告](#)”，第 10 位。

¹¹ 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2009，“[全球人口贩运问题报告](#)”，p. 6。

¹² Dalia Leinarte，“[推特 / @DLeinarte：2020 年 6 月 29 日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选举候选人 纽约](#)”，2020 年 2 月 7 日，上午 8: 14。

¹³ 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2018，“[全球人口贩运问题报告（2018 年）](#)”第 28 位。

¹⁴ 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2020，《[关于在全球移徙背景下贩运妇女和女童的一般性建议草案](#)》

¹⁵ 联合国妇女署和欧安组织，2020，“[应对新出现的人口贩运趋势和 COVID-19 大流行的后果](#)。”



近年来，对“网络犯罪”和基于技术的反人口贩运干预措施日益重视，也大大扩展了培养有关性工作错误信息和宣传有害政策的舞台。2018年，美国通过了《停止纵容性贩运者法令》（SESTA）和《允许各州和受害者打击网络性交易法令》（FOSTA），该法律将性工作者用来宣传服务、筛选客户和共享信息的网站以“促进贩运”为名刑事定罪。

十年来的宣传运动，加上有缺陷的“研究”，将大部分在网络宣传自身服务性工作者描绘成人口贩运受害者。而从中诞生的FOSTA-SESTA极大降低了性工作者安全独立工作的能力。¹⁶与它的目标相反，这项法律也妨碍了调查和起诉人口贩运者的工作，因为人口贩运者将其活动进一步转移到地下，以避免侦查。¹⁷

尽管如此，性工作者使用的在线平台驱动人口贩运的迷思依然存在。一些利益攸关方，包括联合国妇女署和欧安组织在2020年7月的报告中，也毫无根据地声称，COVID-19大流行加剧了对网络辅助人口贩运的脆弱性，以便重申一项既不以基于权利也不基于实证的当前政策议程。

对数字化反人口贩运干预越来越关注，也推动了新的数据收集和监控工具的发展，这些工具既侵犯了性工作者的人权，又归因于一个已经存在严重缺陷的“证据基础”。聚光灯工具由反人口贩运组织Thorn开发，用于识别未成年人口贩运受害者，它承认从数百万的在线性工作广告中收集了数据，根据“这堆数据中有儿童”的假设，与执法部门¹⁸分享这些信息。¹⁹这种厚颜无耻的大规模监视形式使性工作者面临隐私被侵犯和遭受法律起诉，同时强化了围绕网络性工作的危险误解。

Bias and Discrimination, Disguised as Neutrality 伪装成中立的偏见与歧视

显然，最被吹捧的关于性工作的误解是由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偏见造成的，而不是事实和生活现实。然而，这些偏见很少被承认，而且往往存在于“中立”的话术体系中。2019年10月，针对废娼主义女权者对北京+25世代平等论坛性工作能见度的强烈反应，²⁰联合国妇女署的执行主任肯定了该组织在性工作问题上的“中立”立场：

“联合国妇女署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中立的立场。因此，联合国妇女署不支持或反对卖淫/性工作非刑事化/合法化。”²¹

不到一年，在2020年7月的国际网络研讨会上，视频记录了执行主任的声明：

“我们联合国妇女署的核心信念是，所有参与这一行业的妇女都是受害者——无论她们是否认为自己是性工作者，无论她们是否视之为工作——我们视她们为受害者，以

¹⁶ Danielle Blunt and Ariel Wolf, “消除：FOSTA-SESTA 和删除网页对性工作者的影响,” *打击贩运评论* 13 (2020): 117-121.

¹⁷ Lura Chamberlain, “FOSTA: 造成人员代价的敌意法律,” *Fordham 法律评论* 87 (2019).

¹⁸ 紫罗兰蓝, “性、谎言和监视: 打击性贩运的战争出了问题,” *Engadget*, 2019年5月31日。

¹⁹ “聚光灯”, Thorn。

²⁰ “关于北京+25 和世代平等论坛的全球信函”2019年10月17日。

²¹ “联合国妇女署执行主任对2019年10月17日全球信函的答复”2019年10月25日。

及那些购买服务的是暴力侵害妇女者。.....这是最绝望的事情，也是最不健康的事情，也是发生在任何女人的最不光彩的事情。²²”

受害者化的叙述和否定性工作的工作，从根本上不符合对性工作的中立立场。人权利益相关方打着中立的幌子，支持有害和歧视性的信念，有意识地误导和欺骗公众，损害了他们有责任支持的普遍保护。

一些国际和区域人权机构，包括欧安组织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 OHCHR），都强调，“鼓吹错误信息可能损害个人声誉和隐私，或煽动对社会中可识别群体的暴力、歧视或敌意。”²³ 2020年5月，为应对 COVID-19 危机期间错误信息的猖獗传播，联合国发起了全球运动“验证”，致力于宣传有关该流行病的准确信息。²⁴然而，仅仅几个月后，联合国妇女署和欧安组织发表了关于人口贩运和 COVID-19 的有偏见和有实证缺陷的报告，宣传了错误混淆和有害政策，加剧了性工作者对暴力、歧视和刑事定罪的脆弱性。

攻击人权卫士

错误信息也被用来诋毁人权卫士和其他支持性工作的人权的利益相关者。大赦国际于 2016 年通过了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政策，促进性工作非刑罪化，²⁵成了由废娼主义团体、宗教领袖和好莱坞名人支持的反性工作攻击的突出目标之一。

在一封试图阻止大赦国际政策通过的公开信中，反贩运妇女联盟（CATW）错误地声称“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性交易非刑罪化的灾难性影响”，引用了德国和荷兰两个国家的“证据”。而这两个国家是性工作合法化，而不是非刑事化。²⁶与此同时，针对大赦国际的社交媒体运动，使用标签#NoAmnesty4Pimps，汇总了一系列道德判断、毫无根据的主张和明显虚假的信息，试图将大赦国际描绘成“皮条客游说团”的一部分。

还对负责维护人权的个别任务负责人发动了运动。2020年7月，受人尊敬的性与生殖健康及权利专家 Tlaleng Mofokeng 博士被任命为联合国卫生问题特别报告员。由于她倡导性工作的人权，并大声支持性工作非刑罪化，Mofokeng 博士立即受到网上，对她的专业知识诋毁攻击²⁷，包括通过虚构她向少女宣传“卖淫”。²⁸

即将卸任的人口贩运问题特别报告员 Maria Grazia Giammarinaro 也因与反贩运妇女国际联盟（GAATW）合作而于 2020 年 7 月受到警告。该联盟是一个反贩运组织，呼吁将性工作非刑罪化，并明确界定性工作与人口贩运活动。废娼主义团体 CATW 错误地声称人权高专办（支持特别报告员的联合国机构）违反《巴勒莫议定书》和《消除对妇女

²²“SWEAT 对联合国妇女署执行主任意见的回应”，性工作教育及倡导工作队（SWEAT），2020年7月23日。

²³ 欧安组织等，2017，“关于言论自由、“假新闻”、鼓吹错误信息的联合宣言。”

²⁴ ““验证”计划旨在 COVID-19 危机让事实遍及网络空间”，联合国全球传播部，2020年5月。

²⁵ 大赦国际，2016年，“大赦国际关于尊重、保护和实现性工作的人权的国家责任的政策。”

²⁶ 反贩运妇女联盟，“致大赦国际的公开信”2015年7月17日。

²⁷ Barbara Crossette，“并非所有人权理事会专家都是完美的：最新的争议”，Passblue，2020年8月19日。

²⁸ Lisa Correnti，“青少年卖淫的倡导者得到联合国高层职位”，“家庭与人权中心”，2020年9月2日。



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与 GAATW “结盟”。这展示了利用对法律框架的误解来破坏人权机构的稳定的方式。²⁹

结论

操纵和传播错误信息从未如今天这般容易，挑战性工作的主流叙述、立场和“事实”的重要性也就从未如此明显。不加批判地接受这些谎言，会固化危害性工作者和损害国际人权机制完整性的危险政策和做法。然而，尽管存在这些挑战，但实证基础也从未如今天这般广泛和有力，可用于来反击关于性工作的错误信息。社群主导的研究已经形成了这一证据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得到优先考虑，以确保性工作者的声音和生活经验继续被听到。

Project supported by:



²⁹ 反贩运妇女联盟，"[推特 / @CATWIntl: 令人费解？令人震惊？难以理解？.....](#)。”2020年7月20日，晚8:40。